

边屯文化丛书第二辑·理论卷

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 编

云南

郭廷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屯田史话



边屯文化丛书第二辑·理论卷

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 编

云南

郭廷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屯田史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屯田史话 / 郭廷华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3.12

ISBN 978-7-222-21406-4

I. ①云… II. ①郭… III. ①屯田 - 史料 - 轮台县
IV. ①F329.454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4)第004398号

策划编辑: 马 滨

责任编辑: 朱海涛

责任校对: 解彩群

责任印制: 代隆参

装帧设计: 玛达米文化

云南屯田史话

YUNNAN TUNTIAN SHIHUA

郭廷华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50千

版次 202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玛达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21406-4

定价 48.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郭廷华，男，汉族，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人。1949年12月生。曾任中共永胜县纪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丽江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党校客座教授，政协丽江地区工委副主任、政协丽江市委委员会副主席、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会长等。主持编辑研究会内部会刊《边屯文化》及“边屯文化丛书”第一、二辑（共12部），有多篇理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又到秋来果满枝

——“边屯文化丛书”第二辑总序

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会长 郭廷华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促进丽江文化的繁荣发展。

丽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创造了悠久灿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边屯文化就是其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国防、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的统一，都采取了军队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措施，组织戍守边疆的官兵和民众就地屯田垦殖，以供军食，这就是史称的“屯田”或“边屯”。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云南较大规模的屯田始于元而盛于明。明代是云南屯田的鼎盛时期。自洪武年间实行卫所屯田制，推行“寓兵于农，屯田实边”政策以来，大批汉族军民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进入云南。数百年来，随着云南大移民、大开发的历史大潮不断推进，汉族逐步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文化底蕴最深厚的主体民族。屯田移民的先辈们继承了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原汉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创新发展中，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融汇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又具有典型的边地屯戍历史文化特点的边屯文化。边屯文

化是云南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云南汉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云南本土文化的坚强基石和重要支柱。它见证了千百年来云南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体现国家认同和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存共荣、团结和睦、共同发展进步的民族认同等人文精神，更体现了云南本土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厚重性。

边屯文化是丽江多元文化中的重要文化，是丽江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永胜汉族聚居区为代表的边屯文化，更呈现出这一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永胜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明初洪武调卫，设置澜沧卫以来，军屯移民的祖先们，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拓荒精神，与当地各少数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开发经营永胜这片美丽的沃土。他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汉文化，创造出了历史悠久、辉煌灿烂、影响深远的边屯文化，开创了永胜文明开化的新阶段，使永胜成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文化荟萃的风水宝地，成为滇西北历史上传播汉文化的桥头堡。以边屯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多元文化，包括独具特色的毛氏文化、他留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包含了文学、艺术、语言、习俗、服装、饮食、建筑、农耕、生态、宗教等多姿多彩的文化内容，这些地域文化群落和文化内容，是永胜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源泉，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它不仅充分展示了永胜文化发展的辉煌历史，也为丽江多元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成为丽江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的文化源头和文化板块。总之，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边屯文化，是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晶。它与中原文化同根同源，更与边疆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相辅相成。因而它特色独具、博大精深，值得深入研究和开发。

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在丽江市委、市政府和永胜县委、县政府以及市县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充分调动广大理论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开展边屯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使边屯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工作得到不断拓展，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理论专著和理论研究成果，创作了数百篇（幅）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书画、摄影、音乐等文艺作品。这些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成果来之不易，是广大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倾注

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勤奋创作的结晶，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为了较好地保存和促进这些成果的转化，研究会曾于2014年编辑出版了“边屯文化丛书”第一辑共6部作品。丛书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2017年研究会又组织编辑出版“边屯文化丛书”第二辑。这套丛书共包括6部著作：《边屯文化论文精选》《边屯文化散文精选》《边屯文化诗歌精选》和作家高潮明的长篇小说《疼痛的青春》、知名作家李理的长卷散文《车与人生》和郭廷华的理论著作《云南屯田史话》。其中论文精选、散文精选和诗歌精选是从研究会《边屯文化》杂志刊登的数百篇作品以及市内外报纸杂志刊登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佳作。

《边屯文化论文精选》共分为“发展探索篇”“寻古探幽篇”“民族考释篇”“人文地理篇”“文艺评论篇”五个部分。所选理论文章，都是原创论文。作者既有知名专家、教授、作家，也有本土的地方文史专家和专家型领导干部。该书以云南历史上的边疆屯田为例，深入研究探讨了边屯文化的外延、内涵及其人文精神，从边屯文化的历史性、地理性、民族性、社会性、进步性等各个方面，探索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屯田文化，研究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实行屯田制度的规模、成果以及屯田文化对于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及现实意义，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理论创新文集。

《边屯文化散文精选》全书分为“山水之韵”“人文之魂”“风物之情”三个部分，作品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形式灵活自由，情真文美，从不同的视角，生动形象地探究了云南边地屯田开发的历史渊源，揭示了边屯文化的丰富内涵，描绘了滇西北高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具有浓郁的边地生活气息和乡情乡愁。这部散文集的出版，对于深入挖掘边屯历史、研究边屯文化、继承和发扬边屯文化精神、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边屯文化诗歌精选》全书分为“故土情怀”“高原物语”“人间真趣”三个部分。该诗集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本土诗人。诗集内容丰富，有对故乡的深情歌唱，有对爱情的甜蜜赞美，有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探索，有对社会的哲理思考。诗集文笔优美、风格多样，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满含诗情画意的好作品。

长篇小说《疼痛的青春》比较独特，塑造的不是以往读者从类似文艺作品中了解到的形象，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教育事业的神圣和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而是力图更客观更细腻地描写现实，深刻揭示生活的厚重。在该书中，作者以冷峻入微的笔调，深刻描写生活，真实反映人性的本质、青春的欲望、基层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物质的匮乏和精神苦闷，以及贫困给心灵带来的震撼，现实矛盾渗透到教育工作中后引发的思考等，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车与人生》是知名作家李理的新著。全书由《一个轮子的车——鸡公车》《两个轮子的车——手推车、马车、单车》《四个轮子以上的车——汽车、货车、客车、轿车、越野车》等几个部分组成，是一部纪实性的长卷散文。作者用回忆的手法展示了人生中关于车的记忆，巧妙地把车的主线贯穿于人生的经历之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交通工具的历史变革，从而折射出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升华，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广泛的社会意义。该书结构精巧、文笔流畅，从个人的经历中把与车相关的故事娓娓道来，朴实清新，情感动人。

《云南屯田史话》是一部研究古代云南屯田戍边历史的理论著作。全书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以我国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的屯田开发为主线，分析归纳了各个历史时期屯田戍边的形式、规模、内容和特点，阐述了云南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交往，重点研究在古代屯田戍边和移民开发中，云南边疆地区通过多种形式的屯田和移民开发，为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融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云南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宣传和弘扬先辈的屯田精神，对博大精深的边屯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这套丛书以不同的形式，多角度地对博大精深的边屯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艺术地展示了永胜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艺术性，相信广大读者定会喜爱。

我希望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的广大会员和专家学者、文艺家们，要乘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东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多出新作品、好作品，为边屯文化的研究开发、为新时代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做出

应有的贡献。

借此机会，我代表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研究会工作的各级领导、对积极参与边屯文化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套丛书的全体作者和为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审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7年10月于丽江

前 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屯田始终是历朝历代实行的一种重要的生产经营模式。从秦代开始的迁民实边，到明清时期，不论是处于封建国家的大一统时期，还是处于分裂阶段，屯田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始终，都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存在着、延续着，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中国古代的屯田，是指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或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组织士兵和农民开发荒地屯垦耕种，以取得军队粮饷的供给和国家赋税收入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按屯田的组织管理形式及屯田劳动者的不同，有军屯、民屯和商屯等多种类型。按屯田实施的所在地域，又分为内地屯田和边疆屯田。狭义的屯田，主要是指以军屯和民屯为主的生产经营形式。

军屯是封建朝廷为了解决驻防军队的军需粮饷问题，组织戍守官兵就地开垦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实行兵农相兼，寓兵于农的一种生产形式。军屯的劳动者主要是军队官兵及其眷属，平时官兵在驻防地或屯垦区戍守操练，农时耕种，战时出征。通过亦兵亦农、耕战结合、生产自给的形式，既承担了防卫的军事职能，又解决了军饷供给问题，节省了坐食之费，免除了长途转输粮草之苦，因而史称“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以为“其法最善”。历代军屯都具有军事性、边疆性、自给性的本质特点，即军队屯田的首要目的是为防守和征战而屯，属军事性质，因而历代的军屯多设置在地广人稀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并且是为了解决驻军自身的军需粮饷问题而开

展的屯田。由于军屯的这些特征，历朝历代必然会采取这种军事防卫和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军屯方式，并曾取得过显著成效。

民屯是封建朝廷在某一个时期，通过移民或招募流民进行垦荒耕种，以开发土地、发展生产来解决军饷民食的屯田经营方式。与一般的鼓励农民垦荒不同，民屯不仅有固定的屯垦区域，更有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是带有一定的军事强制性质的经营形式。通过建立民屯，既能安置移民，解决平民百姓的生存问题以稳定社会，又能为国家提供丰厚的赋税收入，因而也是历代长期实施的主要屯田形式。

商屯主要有盐屯，源于宋代以来的盐法开中制。是明代普遍施行卫所军屯和移民屯田的同时，为解决边地驻军粮饷，充实边疆粮食储备，利用盐法开中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屯田经营形式。明朝在宋代盐法开中的基础上，鼓励盐商运粮至边地仓库缴纳，由官府按照盐粮的一定比价，给予盐引（领取食盐的凭据），盐商凭盐引领取盐货进行贩卖，从中获取利润，而朝廷以此来解决边地军饷粮储问题。在以粮易盐的过程中，盐商为避免长途转运粮食到边地的艰辛，也为了降低运输粮食的费用，以获得更好的效益，乃在官府拨给的边区土地上募民开垦耕种，以所收获的粮食就地缴纳到官仓，换取盐引领盐贩卖获利，故称为商屯。商屯产生于明代，它在各种屯田形式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也在解决边疆戍守军队的粮饷、巩固边防、开发边地、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清代还出现了少量的矿屯、漕屯等屯田经营方式，也属于商屯的范畴。

历代为巩固国防、保卫边疆，在边疆地区组织开展的军屯、民屯和商屯等屯田，简称边屯。边屯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多有施行，而且是主要的屯田形式。边屯实施的时间很长，地域广泛，对历代封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战国后期，一些诸侯国就已经出现了屯田这种生产方式的雏形。秦代的迁民实边已经具有屯田的性质，两汉时期则在西北边疆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屯和民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屯田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就是屯田制。隋唐以后到两宋、元、明、清时期，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曾经组织实施过有效的屯田经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屯田的形式、规模和成效都大大超越了前代，成为历史上屯田发展兴盛的时期，屯田的

组织管理制度也更加趋于完备和成熟。

纵观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发展史，在每个封建王朝兴起的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都能够革除前代的弊政，做到励精图治、政治修明、重视民生、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逐步实现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承平日久，到了中后期，统治者逐步腐化堕落，残酷剥削压迫人民，逐步走向政治腐朽、经济衰退，或因严重的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封建王朝走向了衰亡。到了人民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统治者也难以统治的时候，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社会动乱，经过频繁的战乱和剧烈的社会动荡，最终的结果就是改朝换代。这种战乱和灾祸，会造成人口的大量伤亡、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物质财富的极其匮乏。出现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甚至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萧条景象。通过改朝换代，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必然会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采取较为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其中常常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招抚无地或少地流民或组织移民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朝廷需要派遣大量军队在边境地区和战略要地征战和镇守。而解决驻防军队的军需粮饷问题，又是朝廷和官府的头等大事，因而也常常采取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军屯方式实施屯田戍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屯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个新的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必然带来屯田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而屯田的发展兴盛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随着统治政权的逐步衰亡，也必然会造成屯田生产经营的衰落。屯田始终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存在和发展，与历代封建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相始终。因此，屯田与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

屯田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封建国家组织的军队屯田和移民屯田，不仅促进了土地开发，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实施屯田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人口的多次大迁移、大融合，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了中原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边疆地区实施军屯、民屯的过程中，大量的屯田军民在边地屯驻，增加了边境地区的防卫力量，使边防得到巩固，为国家创造了稳定发展的条件，为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生产生活环境。屯田不仅能够就地解决驻军粮饷问题，也减轻了因长途转输粮饷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沉重经济和徭役负担。屯田军队和移民的到来，为开发边境带来了大批农业劳动力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一定的资金、物质装备等生产要素。屯田军民在当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集市贸易，推动了这些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边疆落后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屯田军民从内地先进地区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必然带来内地先进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教育文化等等。经过与边疆各民族的共同生息繁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响和吸收，再通过婚姻血缘的融合，逐步走向经济文化的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水乳交融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经过这种长期的融合发展，在边疆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底蕴深厚的地域性文化，这就是边屯文化。边屯文化是通过历史悠久的边疆屯田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丰厚文化资源，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民族构成和民族文化风俗等方面都各不相同，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形成的边屯文化，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又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多样性特点。这就使边屯文化成为中国多元文化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人类的早期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称：“云南，《禹贡》梁州之域，地曰百濮”，属华夏“九州”的梁州之地。自远古以来，在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长期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族群部落。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长期与中原各族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源远流长，从未断绝。

内地较大规模移民云南滇池地区，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司马迁《史记》中简要记述的楚庄驩王滇。这是史籍中关于内地大规模移民云南、开发云南、与当地土著民族相融合的最早记录。秦朝统一以前，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地区的今云南境内，部族林立，较大的有滇国、哀牢国、句町国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开始在云南开道置吏以主之，封建中央朝廷已经在云南部分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两汉时期，先后在云南设置郡县，云南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逐步扩大和加强。秦汉时期云南部分地区郡县的设置，标志着云南已经融入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范畴。

两汉、三国时期的数百年间，内地汉族因征伐、屯垦、流放、经商、避难等多种原因，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大量移入云南。他们在云南与当地土著民族世代杂居，相互融合，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之中。如东汉、三国时期的南中大姓，大多是汉族移民的统治者，在融入云南土著部族、部落后，逐步成为各部族、部落的酋长、头人，民族融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纷乱，群雄并起，战争频繁，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大分化、大组合、大融合的时期。云南各土著民族在长期互相融合及吸纳汉族移民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爨族”。在此基础上，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形成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民族割据政权。这一历史时期，是内地汉族移民云南数量最多、云南各民族融合规模空前的时期。大量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汉族移民在融入土著民族的长期过程中，不断提升了云南各土著民族的整体素质，推动着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

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率十万大军征伐云南，灭大理国，统一云南。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改置路、府、州以统之。从此云南终于结束了自秦汉以来长期由中央朝廷进行羁縻统治或地方割据的局面，正式成为中央朝廷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成为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元代在云南开创了大规模实施移民屯田和军屯的新阶段。为了维护对云南的统治，解决军饷问题，由大批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爨燹军等组成的镇戍军队，在云南“因兵屯田，耕且战”，进行屯垦戍守。同时，大量内地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屯田垦殖、经商，逐步使汉族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工具，选育良种，兴修水利，建桥修路，改善基础条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加快了经济发展。元代在云南重视教育文化的发展，建学校，兴儒学，行科举，使学校教育和汉文化得到普及，取得“垂六十年，吏治文化，

埽于中土”的成效。由于上述原因，自元代开始，汉族逐步发展成为云南的一个单一民族，并不断增强对其他当地民族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汉族人口不断增加，逐步发展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

明代初期，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所军屯是明代的军事制度，军屯、民屯、商屯成为明代屯田的主要方式。明军平定云南后，洪武十五年（1382）即在云南实施卫所军屯。整个明代，先后在云南设置36个军屯卫所，遍布云南腹地和交通要道等战略要地，在广大的平坝、河谷地区实施了长期的军屯。同时朝廷多次从内地大规模移民云南，设立民屯，并在云南募盐商开中，实施了商屯。据史料记载，明代以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大批汉族军民进入云南各地屯田垦殖，逐步改变了当地的民族分布状况，许多地区，特别是平坝地区，汉族成了主要民族。通过与当地民族长期的相互杂居、相互通婚，汉族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血缘融合进一步加强。明朝在大规模实施屯田的同时，重视教育发展和汉文化传播，通过科举取士，云南产生了大批著名人才。各少数民族也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加快。屯田开发促进了云南的土地开垦、水利建设、交通道路等基础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建筑、矿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大量城镇、村落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屯田大量被侵占，官田逐步民田化，屯田制度遭到破坏，屯田已名存实亡。但明代是云南历史上汉族移民进入最多、屯田范围最广、屯田规模最大的鼎盛时期。大量汉族军民的迁入，各种形式的屯田开发，对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南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清代前期，在平定“三藩之乱”后，逐步清理废除原有的屯田制度，裁撤前明军屯卫所，把屯田及其税赋并入地方官府，屯军成为编户纳入地方管理。同时废除庄田制，把明代的“勋庄”及吴三桂的“藩庄”变卖给地主和农民，由所在府、州、县管辖，原有屯田和庄田等土地逐步民田化、私有化，从而加快了云南自耕农经济的发展。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汉唐以来中央朝廷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羁縻统治制度。元明时期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官土司制度，清代前期继续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土司制度适应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

化发展状况，保持了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在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到了明代后期，土司制度的各种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中央朝廷为了维护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逐步实行改土归流。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实施较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措施，在改流的原土司领地废除土司土官，设置府、州、县，派遣流官治理，并驻防军队，把土司地方直接纳入朝廷官府的统治。云南改土归流取得很大成效，未改流的土司数量大为减少，且大多在边境地区，土司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量得到加强。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朝廷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控，客观上也加快了改土归流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清代前期继续实行新的移民屯田政策，绿营兵屯田是清代军屯的主要形式。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统治，绿营兵以镇、协、营分守各地，下设若干汛、塘、哨、卡，遍布云南平坝、河谷和边远地区。清代前期绿营兵的戍守屯田，规模成效远不及明代，但比明代屯田分布的范围更广。自清代前期开始，内地汉族不断大批迁入云南边疆地区开垦荒地，逐步在这些地区安家落户，定居置业，还有很多因手工业、商业贸易、开发矿山等原因进入云南的外来移民。屯田开发在明代的基础上，逐步向边远地区和山区纵深推进，绿营屯军和外来移民遍布全省山区和边疆地区，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带入这些地区，促进了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区各方面的发展。

总之，云南虽然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时期到秦汉以后，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从未间断，并不断加强。特别是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使云南成为完全由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行政区域，并由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屯田开发历史。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各类屯田经营形式在云南的大规模实施，内地汉族军民和其他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进入，给云南边疆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加快了云南融入祖国大家庭的步伐。也逐步改变着云南的民族构成，促进了云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升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和风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既保持了自己的经济社会文

化特色，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特别是自元代以来，随着云南军屯、民屯、商屯的大规模实施，以多种形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文化底蕴最深厚的主体民族。在此过程中，汉族移民与云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共同生存发展，不仅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面相互学习借鉴、相互吸收，在文化和民风民俗等方面也不断交融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由此形成了云南异彩纷呈、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体系。以移民为主体形成的云南汉族，继承和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汉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逐步形成云南特有的屯垦文化，即云南边屯文化。云南边屯文化是地域性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为核心，融汇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又具有典型的屯垦戍边历史文化特点，是特色鲜明的云南地域文化，是云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本土文化的厚重基石和重要板块。它见证了千百年来云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祖国内地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体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存共荣、团结和睦、携手进步、共同发展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人文精神，更体现了云南本土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厚重性的特点。因而，云南边屯文化就具有与其他省份边地文化不同的特点和价值，值得深入地进行挖掘、保护和传承发展。地处滇西北高原的永胜县，在云南边屯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开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先河，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永胜县地处滇西北高原的金沙江流域，自古就是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隘，素有“北国胜门”之称。由于永胜战略地位重要，加之境内江河纵横、资源丰富，特别是平坝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然条件很好。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朝廷调遣屯驻于省城的云南中卫到北胜州（今永胜），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澜沧卫成为明代设置在云南的36个军屯卫所之一。来自内地的汉族官兵及其眷属随军进入永胜，以百户伍为建制，屯驻于北胜州的主要坝区及河谷地区进行屯田戍守。他们亦兵亦农，拓荒垦殖，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生息繁衍，共同开发这片沃土，从此开创了永胜农耕文明发展的新时代。

澜沧卫入驻永胜进行屯田垦殖，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撤卫所，归并地方官府管辖，历时近300年，其间不断有外来移民以多种方式进入永胜。通过长期的发展，在境内的平坝及金沙江河谷地区形成了大量以屯伍为标